



〔俄罗斯〕

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编撰

世界文学史

第六卷·下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

014061242

I109

111

V6-2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俄罗斯〕

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编撰

世界文学史

第六卷·下册



I109

111

V6-2

上海文艺出版社



北航

C1748352



北航

C174835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文学史. 第6卷/俄罗斯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撰; 杜文娟等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12(2014.7 重印)

ISBN 978-7-5321-5160-8

I. ①世… II. ①俄…②杜… III. ①世界文学—文学史

IV. ①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9075 号

责任编辑: 赵南荣 胡艳秋

封面设计: 王志伟

世界文学史·第六卷

(俄罗斯) 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编撰

杜文娟等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74.25 插页 8 字数 1,326,000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160-8/I·4071 定价: 249.00 元(上下二册)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780459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МИР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м. А. М. ГОРЬКОГО

ИСТОРИЯ ВСЕМИ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ТОМ ШЕСТОЙ

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КОЛЛЕГИЯ ТОМА

И. А. ТЕРТЕРЯН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Д. В. ЗАТОНСКИЙ, А. В. КАРЕЛЬСКИЙ,
В. К. ЛАМПУКОВ, Ю. В. МАНН, Н. С. НАДЪЯРНЫХ,
С. В. НИКОЛЬСКИЙ, З. Г. ОСМАНОВА,
Б. Л. РИФТИН, Е. Ю. САПРЫКИН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9

第三编 外高加索文学

• 436

本编序言

十九世纪上半叶,外高加索各民族的文学史与前几个时期一样,具有许多共性和民族个性,其共性是在本地区的政治历史、地区行政、经济状况和文学过程的客观规律的影响下形成的。这一政治历史极具戏剧性。1795年梯弗里斯(现第比利斯)被波斯沙赫阿加-穆罕默德·卡贾拉的军队攻占并摧毁。整座城燃烧了八天。在这场大火中,不仅烧毁了大量的奇珍异宝,也烧毁了许多精神和文化珍品。由于各民族渴望摆脱伊朗沙赫王和土耳其苏丹王的侵略,渴望保护自身的生存,于是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结成友好联盟,后来东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也发起运动加入了俄罗斯。这场运动在十九世纪前三十年内彻底完成。在这三十年间发生了俄罗斯—伊朗和俄罗斯—土耳其流血战争,俄罗斯在战争中取得了重要的军事—政治胜利。与伊朗签订的古里斯坦和约(1831)和土库曼恰伊和约(1829)以及后来与土耳其签订的亚得里亚堡和约(1829),巩固了外高加索(包括北阿塞拜疆在内)与俄罗斯的联合,而南阿塞拜疆和大不里士市的中心仍处于伊朗政权的统治之下,所以从那时起,南、北阿塞拜疆就按照各自不同的道路向前发展。

加入俄罗斯给外高加索各民族带来了盼望已久的和平,他们避免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和内讧,避免了野心勃勃的邻国的毁灭性侵袭,因为这些邻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者贪图所唆使,为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发动战争。

随着城市居民数量的不断增长,开始了有用矿物的加工工业。外高加索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逐渐加入到全俄民族解放运动中,并开始研究俄罗斯的先进文化。自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计划中这些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它们伴随着农民、手工业者反对那些不愿丧失政治和经济特权的地

方显贵、僧侣和贵族代表的反封建、反沙皇斗争。导致类似斗争发生的理由通常是由于沙皇行政当局对劳苦大众征收苛捐杂税,在许多情况下不愿考虑当地的生活特点和风俗习惯,实施有损于民族文化和文学发展利益的俄罗斯化。

但是尽管存在各种客观历史矛盾和困难,在这一时期仍奠定了各民族相互接近和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基础,加强了与先进的俄罗斯文化的联系。十二月党人运动的思想成为外高加索文学新趋势发展的巨大促进因素。因为早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卫国战争时期,许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人就在作战部队服役,他们不仅与俄罗斯士兵并肩作战,而且与俄罗斯军官也密切接触,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秘密解放组织的成员。十二月党人运动被镇压后,丘赫尔别凯、别斯图热夫(马尔林斯基)、亚·奥多耶夫斯基都被流放到高加索。亚·格里鲍耶陀夫的命运、亚·普希金、米·莱蒙托夫、杰·达维多夫、Я.波隆斯基等人的许多生活和创作篇章都与高加索联系在一起。

在各民族间的相互交往、外高加索与俄罗斯进步作家和文化活动家的结合中,定期刊物发挥了重要作用。1816年在阿斯特拉罕出版了由К·谢瓦尔疆主编的周报(亚美尼亚文)(《东方新闻》),这不仅是在俄罗斯的第一份亚美尼亚报纸,也是第一份亚美尼亚—俄语双语报纸。1828—1832年在梯弗里斯出版了俄语和格鲁吉亚语双语版(从1829年开始还发行了法尔西语版,1832年发行了阿塞拜疆语版)周报《梯弗里斯报》(亚美尼亚文)。

亚·普希金在给П·先科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梯弗里斯报》是唯一的俄文报纸,该报有自己的特点并经常能看到许多有趣的文章。”在高加索,亚美尼亚的期刊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1846年在梯弗里斯出版了亚美尼亚报纸《卡夫卡斯》,1850—1851年出版了由加·帕特卡尼扬^①主编的政治、商业和文学报纸《亚拉腊》。一些文化中心发挥着巨大作用,例如,梯弗里斯的涅尔谢相学校(1770—1857)和拉扎列夫斯基东方语言学院(1815年在莫斯科成立),从这两所校园里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外高加索和俄罗斯文化与文学活动家。

与此同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文学在各自的民族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它们带着各种思想—美学知识和艺术积累进入了各自历史的新阶段。民主化进程是它们的共同特点,遍布于精神生活、文化和文学的各个领域。这个进程并不是最后才触及民间歌唱诗人的创作,这些歌唱诗

① 拉法埃尔·加布里罗维奇·帕特卡尼扬(1830—1892),笔名加马尔·卡季帕,亚美尼亚作家,著有组诗《自由之歌》。——译注

人继续了诗人萨亚特-诺瓦^①的传统。他曾用三种语言进行创作,并惨死在梯弗里斯教堂的台阶上。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民间歌唱诗人(沙姆奇·梅尔科、许库希、阿希克·佩里、纳巴季等)的长诗中体现了爱国主义英雄气概,诗歌的主题明显地拓宽,个人自我意识感和团结一心共同抗敌的感情也大大加强。文学手法、文学流派和创作风格都产生了交替,它们反映了新时代的社会需求和人民的强烈意向,也意味着中世纪文学的终结。例如,在亚美尼亚文学中,古典主义主要关注古代和中世纪,缅怀已逝去的昔日王朝(米纳相、A. 巴格拉图尼王朝),取而代之的是开始转向表现个人与落后的封建秩序、教会、古代(A. 阿拉姆达里扬、M. 达吉阿江等王朝)迷信之间冲突的文学。在旧的亚美尼亚格拉哥里语——一种用于古典主义、历史文献和历史作品的语言,与取而代之的迅速发展起来的新的人民语言——阿什哈拉巴尔语之间展开了斗争,而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就有几部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哈·阿博维扬的长篇小说《亚美尼亚的创伤》、Г·阿利尚的长诗等)使用了新语言进行创作。应该记住的还有,亚美尼亚文学及其传统是在东、西(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和世界许多其他国家中(亚美尼亚文化的古发源地是在印度的两个城市——加尔各答和马德里、意大利的威尼斯和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形成的。

在格鲁吉亚人民的社会生活中新思潮也是与民族自我意识的突飞猛进增长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反映在一大批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中,其中包括格鲁吉亚浪漫主义的奠基人亚·恰夫恰瓦泽、诗人格·奥尔别里安尼,稍后的所·拉兹马泽、米·图马尼什维里和瓦·奥尔别里安尼。尼科洛兹·巴拉塔什维里的创作达到了浪漫主义的顶峰。

在格鲁吉亚浪漫主义文学中,历史题材(瓦·奥尔别里安尼的《举杯祝愿健康》、尼·巴拉塔什维里的《格鲁吉亚的命运》等)占有显著位置。

格鲁吉亚诗歌语言的大众化在很大程度上与摆脱东方风格和华丽辞藻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强烈地希望掌握俄罗斯和世界文学的经验密不可分。亚·格里鲍耶陀夫的岳父亚·恰夫恰瓦泽翻译了普希金、高乃依和拉辛的大量作品,亚美尼亚浪漫主义诗人Г. 阿利尚大约与此同时翻译了席勒的《钟之歌》以及拜伦的长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中的一首诗。在三十

① 萨亚特-诺瓦(1712—1795),原名阿鲁琼·萨亚江,亚美尼亚诗人,亚美尼亚中世纪世俗诗歌的最杰出代表,以游方歌手著称。他用亚美尼亚文、格鲁吉亚文、阿塞拜疆文写作诗歌。长于写爱情抒情诗(《卡曼恰》、《我要这样生活》)。——译注

年代初,根据格·埃里斯塔维^①和瓦·奥尔别里安尼的倡议,将格里鲍耶陀夫的《聪明误》译成了格鲁吉亚文。

在这三个民族的历史中,文学体裁的革新是与民族戏剧和剧院(格·埃里斯塔维、哈·阿博维扬、米·法·阿洪多夫)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

在这三个民族的文学中,浪漫主义具有混合性特点,它吸收了其他艺术流派的各种成分。例如,恰恰图尔·阿博维扬就其精神实质、色彩表现手法、对自由理想的不懈追求来讲,是位浪漫主义作家,他为亚美尼亚三十至四十年代的社会思想的民主—启蒙方向奠定了基础。

启蒙运动的趋势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阿塞拜疆文学中也具有代表性。阿塞拜疆启蒙运动的特点是阶级无差别和泛民主主义,这两点既显示了其强有力的一面,也暴露了其较软弱的一面:“……它既吸收了革命资产阶级的理想:反特权、个性觉醒、崇拜自由、世俗教育;也从革命民主政治(主要是俄国的民主政治)那里获得不少东西:例如,无神论、激进主义、武装暴动思想……通常是消极抵抗的。它的软弱性表现为问题的真正解决仍极端驳杂不统一……”(Я. 卡拉耶夫语)。

艺术文化和社会思想的迅速发展导致一个阶段与另一个阶段的迅速更替,尽管前者还没有彻底展现或丧失其一切潜力。阿塞拜疆早期启蒙运动的首批代表有学者兼诗人的阿巴斯-库利·巴基哈诺夫、诗人米尔扎·沙菲·瓦泽赫、作家伊斯梅尔-贝克·库特卡申斯基。他们不仅将同宗教狂热分子、伊斯兰教社会中十分强大的封建君主专制、人民的经济文化落后和闭塞作斗争的思想带入文学中,而且也带入了新的体裁:通俗小说、情节长诗、喜剧,塑造了新的人物形象,表达了对“小人物”的同情。暴露性讽刺诗在卡苏姆-贝克·扎基尔的创作中达到了高峰。阿塞拜疆唯物主义哲学家、戏剧奠基人、喜剧家兼出版家米·法·阿洪多夫活动的开始和极盛,正处于这一时期。

在上面提到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诗人和作家的个人创作中(更不用说格鲁吉亚的作家了),梯弗里斯起着巨大作用,他们中的许多人曾长期居住在这里并进行创作。

外高加索各民族的文学逐渐克服了本民族的局限性,制定出新的文艺思想原则,掌握了新的体裁,创立了大众化语言。外高加索文学彼此间的联系及其与俄罗斯文学的联系得到了巩固。

^① 格奥尔吉·达维多夫斯基·埃里斯塔维(1811—1864),格鲁吉亚作家、戏剧活动家、翻译家。作品有现实主义喜剧《瓜分》、《讼争》、《吝啬人》、《旧日场景》,对格鲁吉亚戏剧的发展有一定影响。——译注

第一章 格鲁吉亚文学

十九世纪初格鲁吉亚人民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具有重大政治和社会意义的历史事件：1801年9月12日，根据亚历山大一世的诏书，东格鲁吉亚（卡特利-卡赫齐亚王国）并入俄罗斯帝国。在此事件之前的一连串其他事件中，特别应当提到的一件事就是1783年7月24日在格奥尔耶夫斯克签订的和约，根据此和约，东格鲁吉亚这个被土耳其和波斯不断侵略变得软弱无力的国家开始纳入俄罗斯的庇护之下，但仍保留其国家主权，而俄罗斯则承担起保护其免遭邻近伊斯兰教国家侵犯的责任。这个和约反映了当时格鲁吉亚进步阶层的政治愿望。

卡特利-卡赫齐亚王国的内部危机在波斯可汗阿加-穆罕默德·卡贾拉（1795年）大军的毁灭性侵略后和希拉克利二世（1720—1798）去世后变得尤其尖锐。皇位继承人之间内讧四起，封建割据主义日趋白炽化，外部政治形势紧张激烈，这一切促使沙皇政府取消东格鲁吉亚的主权并将其并入俄罗斯版图，随后西格鲁吉亚的命运也如此，并入了俄罗斯。

并入俄罗斯给格鲁吉亚带来了盼望已久的和平，其成果很快变得有目共睹。关于这一点伊利亚·恰夫恰瓦泽^①写道：“好久未感受到安宁，被掠夺和破坏以及连绵不断的战争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国家终于平静下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纪开始了，这是一个充满了宁静祥和的世纪。”

但是随着格鲁吉亚并入俄罗斯，格鲁吉亚人民开始承受超负荷的双重压制（民族压制和社会压制），这就引起了所有阶层居民的愤怒和抗议。十九世纪前十年在格鲁吉亚此起彼伏的人民起义具有巨大意义，它们唤醒了社会意识，并使民族进步力量在反专制的斗争中团结在一起。

向沙皇专制的殖民地制度发起抗议的还有著名的1832年爱国主义密谋，它是格鲁吉亚人民解放运动中最重要阶段之一。这次密谋是在格鲁吉亚贵族知识分子界酝酿成熟的，其代表们汲取了十二月党人运动的经验和三十年代的欧洲民主主义思想，抱定目标不仅要使格鲁吉亚摆脱殖民地的依附地位，而且要彻底改变其社会—政治制度。密谋者的左翼以著名的作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所罗门·多达什维里（1805—1836）为首，他们拥护在格鲁吉亚实行共和体制。

正如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反映了先进的俄罗斯的社会要求一样，

^① 伊里亚·恰夫恰瓦泽（1837—1907），格鲁吉亚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著有长诗《幻影》、《强盗卡科》，小说《他是人吗》。——译注

1832年的格鲁吉亚密谋是格鲁吉亚社会先进分子进步愿望的表现,它深刻表达了格鲁吉亚的社会和民族利益。尽管密谋者失败了,但他们的追求和夙愿,正如伊利亚·恰夫恰瓦泽所中肯恰当的表述:“在生活的垄沟里播下了种子。”

虽然格鲁吉亚的语言和文化遭到沙皇专制的迫害与压制,但是格鲁吉亚社会的先进代表们却成功地利用新的“和平条件”实现了自己的爱国主义目的。1819年开始出版发行《格鲁吉亚报》,很快又改名为《格鲁吉亚人报》。为了便于通过书刊检查,这份周刊的所有资料都先用俄语编写,然后再译成格鲁吉亚语。1828年创办了《梯弗里斯公报》(用俄语和格鲁吉亚语出版)。1832年所·多达什维里出版了第一份格鲁吉亚文学杂志——《梯弗里斯公报文学版》,它在格鲁吉亚报章杂志和社会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这一时期文化—教育工作也明显扩大了,许多著名的古格鲁吉亚文学文献开始被研究和推广,创作和翻译活动也活跃起来。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与西欧古典主义作品一起被紧锣密鼓地译成格鲁吉亚文,在格鲁吉亚,对俄罗斯作家作品的兴趣从十八世纪起就逐渐增强。对下列一些欧洲(首先是法国)及俄罗斯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的代表人物尤其关注:孟德斯鸠、拉辛、高乃依、伏尔泰、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杰尔查文、安季奥赫·康捷米尔、赫拉斯科夫^①、特列季亚科夫斯基^②,等等。这些作家的作品大量被译成格鲁吉亚文(而后来是改编和模仿),这本身就证明了格鲁吉亚翻译家们的审美趣味和文学倾向,而这些审美趣味和文学倾向也清晰地表现在他们自身的文学创作中。

虽然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格鲁吉亚作家,其压倒多数的创作并没有达到很高的(全欧的)艺术水平,而且常常具有折中主义和模仿者的特点,但是他们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却促进了格鲁吉亚文学的欧化,这完全符合格鲁吉亚许多世纪以来的宗教文化传统,因为这种文化在其自身的发展中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和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只是到了十八至十九世纪才被迫与其脱离关系。

在格鲁吉亚文学中,古典主义的影响极其强烈地被意识到是在十九世

① 米哈依尔·马特耶维奇·赫拉斯科夫,俄国作家,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最著名的著作是叙事诗《罗斯记》(1779),描写伊凡四世征服喀山。——译注

② 瓦西里·基利洛维奇·特列季亚科夫斯基(1703—1769),俄国诗人,语言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他在《简明俄罗斯诗歌作法新编》一书中确立了俄国诗歌音强音节体原则。他是俄国古典主义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创立了新的诗歌题材,作有诗歌《季列马希达》。——译注

纪二十至三十年代,但是必须指出,早在十九世纪初,在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中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的背景下,古典主义就明显像一个特殊的遗迹,像上个世纪的文学惰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克服这种惰性的迫切需要变得越来越明显。

十九世纪上半叶格鲁吉亚作家也十分重视感伤主义,他们不仅将那些深受格鲁吉亚读者喜爱的西欧和俄罗斯感伤主义的经典之作译成了格鲁吉亚文,而且在其影响下创作出许多独出心裁的感伤主义作品(例如,Д. И. 巴格拉季奥尼的长篇小说《新希赫》就是在卢梭的《新艾洛绮斯》的影响下创作的,并且表现出与萨·理查逊^①和尼·米·卡拉姆津的作品^②的相似性)。

虽然感伤主义和古典主义对格鲁吉亚的文学创作影响不大,并且最终也没有历史发展前途,但是,尽管如此,它们却在格鲁吉亚文学的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格鲁吉亚文学的欧化发展进程。

浪漫主义成为在格鲁吉亚艺术语言发展中留下不可磨灭遗迹的进步运动。由于国家丧失民族独立而引发的浪漫主义情绪,从十九世纪初就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晚些时候,在1832年反君主主义专制密谋后(这次密谋是十九世纪格鲁吉亚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分界线),浪漫主义逐渐成为格鲁吉亚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流派。在意识方面发生了深刻性的转变,它在唤起民族自我意识方面留下了决定命运的痕迹长达数十年。

1832年,由知识渊博的同胞们的先进思想培养起来的信仰彻底破灭了,对现存事物的合理性的信仰彻底破灭了,尽管后者曾激发起一整套实践观点、概念和纯理性主义理想,并且又都是长期探索,实事求是的行动结果。毫不奇怪,“理性”的这种破产导致了对推动世界前进的万能秩序的合理性的怀疑。人的个人命运、社会的发展、民族生活的前途和整个人类历史都变成了盲目必然性活动的场所,而盲目必然性活动的不可知性和非理性主义法则使现实具有致命的矛盾性特征。这就是那些浪漫主义情绪,那个十九世纪格鲁吉亚浪漫主义赖以产生的思想根基。

这是一个充满怀疑、悲观、痛感生不逢时和强烈不满的时代,但是在这个绝望的大环境中,在格鲁吉亚浪漫主义的内部却酝酿成熟了一种新的武器——即根本改变现实的思想 and 决不妥协的反抗精神;拟定了新的行动方案——即非折中的最高纲领主义,它必定对未来几代人的意识产生深远影响。

① 萨·理查逊,英国小说家,这里指他的小说《克拉丽莎》。——译注

② 此处指他的小说《苦命的丽莎》。——译注



列兹金卡舞 梯弗里斯近郊的一个花园

格·加加林画 1840年

在格鲁吉亚浪漫主义史上,占最重要地位的诗人是亚历山大·恰夫恰瓦泽、格里戈尔·奥尔别里安尼、尼科洛兹·巴拉塔什维里和瓦赫坦格·奥尔别里安尼,在这些诗人的诗歌创作中,包含了浪漫主义在格鲁吉亚走过的全部发展历程,从中既可以找到浪漫主义潮流的思想倾向性在十九世纪格鲁吉亚文学中的鲜明反映,也可以找到浪漫主义潮流的类型学特点及其高超艺术方法的鲜明反映。

亚历山大·恰夫恰瓦泽(1786—1846)不仅是格鲁吉亚文学生活中赫赫有名的人物,而且也是格鲁吉亚社会—政治生活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是俄罗斯帝国宫廷附属的卡特利-卡赫齐亚王国的全权大使加尔谢万·恰夫恰瓦泽(他有幸签署了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的历史性友好条约——格奥尔吉耶夫斯克条约)的儿子,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教子。亚·恰夫恰瓦泽十七岁时参加了山民的反沙皇农奴制起义(1804),因此被捕并被流放到坦波夫。但是由于顾及其父亲德高望重、功勋卓著,国王很快便赦免了这位年轻诗人,并将其编入贵胄军官学校。1813—1814年亚·恰夫恰瓦泽参加了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他当过巴克雷-德-托里将军—元帅的副官,由于在战斗中表现英勇被授予多枚勋章和一把金马刀。1827—1828年亚·恰夫恰瓦泽参加了俄罗斯—伊朗战争和俄罗斯—土耳其战争,战斗中他又表现出军人的英勇无畏和作为统帅的卓越胆识。

1832年密谋暴露后,亚·恰夫恰瓦泽重新被流放到坦波夫省,从流放地回来后,他开始官运亨通。

三十至四十年代,在亚·恰夫恰瓦泽的家里经常聚集着许多著名的格鲁吉亚活动家、诗人、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亚·伊·奥多耶夫斯基、弗·费·拉耶夫斯基、A. H. 雅库博维奇)。有充分证据表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也经常光顾这里。由于恰夫恰瓦泽与格里鲍耶陀夫有亲属关系(后者娶了恰夫恰瓦泽的长女尼诺),这使他与俄罗斯社会的先进代表的关系变得尤为密切。

在亚历山大·恰夫恰瓦泽的家里诞生了新的格鲁吉亚戏剧思想。在他的领导下创立了戏剧社,继承了十八世纪格鲁吉亚戏剧特有的古典主义传统。亚·恰夫恰瓦泽将伏尔泰、拉辛、高乃依的一系列戏剧作品翻译成格鲁吉亚语;他还翻译过拉封丹的寓言以及雨果、杰尔查文、茹可夫斯基、普希金的诗歌。

作为思想家,亚·恰夫恰瓦泽的成就在许多方面应归功于法国启蒙主义,其中,他的哲学论文《从近处观察到的人》(1804)就是受到卢梭的天赋人权思想的启示,这篇论文很显然是从法语意译过来的。恰夫恰瓦泽的《格鲁吉亚 1801 年至 1832 年状况历史概要》证明了其渊博的历史知识,在这部作品中诗人大胆地批判了俄国专制政体的殖民地政策。

亚·恰夫恰瓦泽的诗歌是以格鲁吉亚丧失民族独立而引起的深深痛苦为基础的,这个主题不仅在诗人的那些爱国主义诗歌(重现祖国昔日辉煌景象并将其与残酷的现实进行对比)中响起,而且诗人还赋予它的那些隐秘感受以独特的色调。诗人的爱情抒情诗是“他内心的痛楚呻吟,这呻吟不是由单恋引起,而是由许多更深刻的原因引起,这些原因就是——格鲁吉亚的命运”。尽管由祖国失去昔日辉煌和自由所引起的忧愁在诗人的创作中并没有成为那些意义深远的思想探索和社会探索的动因,亚·恰夫恰瓦泽也没创作出什么典型形象(这些形象因其客观内容可能会成为指引新的历史道路的鼓舞性纲领),但是,根据伊利亚·恰夫恰瓦泽的公正评价,正是在亚·恰夫恰瓦泽的诗歌中奠定了爱国主义的公民主题,这个主题以后成为十九世纪整个格鲁吉亚文学的主要主题之一。

民族解放思想在亚·恰夫恰瓦泽的创作中与社会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上个世纪的格鲁吉亚诗歌中,他首次提出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并谴责了那些“靠掠夺大饱私囊的掠夺者和压迫者”(诗歌《悲伤这个世界……》)。恰夫恰瓦泽相信,被压迫者和赤贫者必将胜利,而奴役者必将灭亡。

亚·恰夫恰瓦泽的诗歌思维(除《戈克恰湖》外,还有其他几部主要是晚期的诗歌)就其本质来讲是传统的,尽管在诗人的抒情诗中已经感觉到有许多新的精神需求日渐成熟,但就其主要的诗学原则来看,他在很长时间

里仍是古格鲁吉亚诗歌大师们的忠实追随者,仍是“鲁斯达维里^①时代”和格鲁吉亚“复兴”时期所建立的诗歌世界的忠实追随者。

亚·恰夫恰瓦泽是格鲁吉亚最后一位“多神教”诗人,他创作的诗歌充满了享乐主义的情绪。“感知力”——这种尘世赋予的享受才能,诗人视它为“上天呈现”给人类的一切精神能力中最高强的能力。爱情——这种尘世幸福的最强烈、最完美的体现,亚·恰夫恰瓦泽将它与感性享受联系在一起,爱人那“赏心悦目的美貌”对诗人来说是取之不尽的赞美对象。

但是亚·恰夫恰瓦泽的享乐主义是消极的,因为它是由于人意识到自己在冷漠的大自然的可怕力量面前孤立无助而产生的。崇拜享乐对于诗人来说是唯一的可以从残酷的现实中拯救出来的办法。

442 · 诗歌《戈克恰湖》(1841)在诗人的创作演变中是一个明确的阶段。《戈克恰湖》贯穿着对现有世界秩序不完善的痛苦意识,贯穿着人的崇高追求与其生活的现实条件之间的悲剧性矛盾感。由于这首诗是对具体情感体验结果的总结,因此它明显有别于诗人之前的那些格鲁吉亚古典哲学抒情诗,这种差异与诗人亚·恰夫恰瓦泽本人早期的诗歌(《人类生命的季节》、《啊,这个世界》)相比尤为明显,在早期的诗歌中,作家的观念似乎早就形成了,并表现为完整的结论和格言形式。

从形式上看,这首诗的显著之处在于,诗人在这里既剔除了传统的“东方”隐喻手法,也摆脱了合乎规范的诗歌格律,而转向格鲁吉亚浪漫主义作品中最中意的十四音节交叉韵诗歌,这种新形式更适合于表达作者的诗歌联想、思想活动、内心感受和精神状况。作为《戈克恰湖》的作者,亚历山大·恰夫恰瓦泽是格鲁吉亚浪漫主义最具特色的代表之一。

格里戈尔·奥尔别里安尼(1804—1883)就出身来讲,也属于上层贵族显贵。十八岁时他就开始了军旅生涯,在俄罗斯—土耳其战争和俄罗斯—伊朗战争(1826—1829)中战功显赫。由于参加了1832年密谋,他被逮捕并被逐出格鲁吉亚。回到故乡后(1838年),格·奥尔别里安尼在达吉斯坦生活了大约二十年,参加过反对沙米尔的军事行动。1862年获得了将军—副官称号。在其后的岁月里奥尔别里安尼在高加索担任过几个高级行政职务,还一度担任过沙皇总督的职务。

在奥尔别里安尼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格鲁吉亚浪漫主义发展的整个历程——从开始到全盛再到衰落——都有着独特的反映,正是这一点决

① 鲁斯达维里·绍塔,格鲁吉亚十二世纪伟大的人文主义诗人。著有天才诗篇《虎皮武士》,是格鲁吉亚封建文化的极峰,世界文学的优秀作品。他的诗篇对于以后整个格鲁吉亚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译注

定了他诗歌的独特性——多神教感觉主义与东正教神秘主义并存,穆哈姆巴济体诗与圣诗共处,爱情赞美诗与爱国主义哀诗同在。

奥尔别里安尼的创作,其抒情世界,各种情节主题,其独特艺术风格都是在古格鲁吉亚文学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但是,早在创作道路开始之初(1827),格·奥尔别里安尼就不断克服格鲁吉亚古典诗体的惰性,并很快成为浪漫主义流派的诗人。

虽然奥尔别里安尼的成熟创作也具有某种内在的矛盾性,但是与此同时,作为世俗享乐的歌颂者和神秘主义悲歌的作者,委婉含蓄的抒情家和梯弗里斯手艺人日常生活的鲜明刻画者,浮华生活的宣传者和诗人崇高公民使命的倡导者,格·奥尔别里安尼在创作演化过程中却能够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没有内在折中主义的风格。

在十九世纪的格鲁吉亚诗人中,格·奥尔别里安尼在《告别》(1832)中第一次用语言作为表达个人内心世界的不完善手段表现了浪漫主义的不满情绪。也是在这首诗歌中,在这首已经十分明显地感觉到迫切希望恢复古典主义诗歌词汇的作品中,爱情作为诗人非常独特的和无与伦比的心灵状态,即能够表达诗人的天性及其复杂丰富的精神世界的特殊性和异常性,以一种全新的、浪漫主义者所理解的特有诠释表现出来。

在格里戈尔·奥尔别里安尼的意识中发生的深刻转变,对强烈推动浪漫主义主题和情绪产生的心灵上的特殊尖锐转变,都与1832年的戏剧性事件密切相关。密谋参加者的政治追求清晰地表现在他的诗歌《自白》中,这首诗是以雷列耶夫的长诗《纳利瓦伊科》中的一章为基础创作的。在调查“密谋事件”时,对奥尔别里安尼提出的最严厉指控就是他对待雷列耶夫被禁作品的态度。

在奥尔别里安尼的《自白》中,对祖国的热爱之情直接与自由思想结合在一起并充满了革命精神,因此它是格鲁吉亚民族解放运动中最杰出的诗歌作品之一,同时它也是一首新体诗,因为在其革命激情方面开创了十九世纪格鲁吉亚公民抒情诗的独特艺术特性。

1832年事件不仅使格·奥尔别里安尼的诗歌感觉更加敏锐,而且在诗人的内心世界里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在监狱禁闭度过的日子和流放异乡的遭遇,不仅永远粉碎了年轻诗人的幻想,也使他的诗歌处世态度具有特殊的色调。诗歌《致我的姐姐叶菲利米娅》(1835)是一首独特的诗歌自白。灵魂孤独的主题,对尘世美景和快乐的“不信任态度”,使这首诗成为十九世纪格鲁吉亚浪漫主义诗歌中最杰出的典范之一。但是,格·奥尔别里安尼虽然对客观现实不满,却从来也没完全与之疏远,尽管有时他把现实的情况看作是疲惫灵魂的临时住所,但是作为诗人,他又陶醉于世俗住所那

甜蜜醉人、“多姿多彩”的美景。

443 · 与格鲁吉亚古典抒情诗的代表们相比,格里戈尔·奥尔别里安尼对周围物质世界的描写更直接、更生动、更突出。尽管大自然在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中通常是精致的、高尚的(格·奥尔别里安尼对大自然的浪漫主义感情丰富了格鲁吉亚的诗歌,功劳卓著),但它仍然以多姿多彩、富丽华美的面貌呈现在眼前,同时保持着自己的沁人芳香和鲜艳色调。诗人敏锐的色彩感和素有的诗歌领悟力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一组献给古老的第比利斯的诗歌中。这座城市像一个独特的世界,它有着奇异的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单纯但真诚的高超艺术,令人惊奇的勃勃生机,对诗人来说就如同是一座“救生岛”。

古老的伊维利亚主题、往事主题和为祖国无私奉献的主题,不仅在格·奥尔别里安尼的诗歌中,在格鲁吉亚的所有浪漫主义诗人的创作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长诗《举杯祝愿健康》,1827—1870年,《致亚拉利》,1832年,等等)。在奥尔别里安尼的诗歌作品中,往事被理解为是“第二现实”,是真实现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位杰出的格鲁吉亚浪漫主义作家的文学遗产,除了诗歌创作外,还包括散文日志(《我从梯弗里斯到彼得堡的旅行》,1831年、大量画稿、一部书信集,这部书信集对评价他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学进程具有巨大意义。格里戈尔·奥尔别里安尼是第一个将克雷洛夫的寓言翻译成格鲁吉亚语的诗人,他还翻译并模仿过茹可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赫尔德^①等人的作品。

格·奥尔别里阿尼的抒情诗对十九世纪上半叶格鲁吉亚诗歌的复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不仅善于克服格鲁吉亚古典抒情诗的“惰性”,使格鲁吉亚诗歌摆脱了多世纪以来形成的形式规则的霸权地位,而且善于探索新的道路,探索新的诗歌手段和形式。

尼科洛兹·巴拉塔什维里(1817—1845)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公爵家庭。梯弗里斯中学毕业后,他在判决及执行科担任普通官员。在纳希切万度过了半年,在甘贾^②当过几个月的县长助理后便去世了。据官方消息,二十八岁的诗人死于恶性疟疾。

巴拉塔什维里的精神悲剧是人的悲剧,他生来为了享受丰富多彩的积

① 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1744—1803),德国思想家、作家。在十八世纪最先企图用历史来解释文化现象,但他基本上是从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认识历史的。他对青年歌德和反封建的狂飙突进运动都起了很大的影响。——译注

② 甘贾,即基洛瓦巴德。——译注

极生活和活动,但实际上却被认定是无所作为。巴拉塔什维里的诗歌是建立在尖锐的矛盾冲突、无尽的惶恐不安和深深的内心慌乱基础之上的。思想和物质、理想和现实在这里一直处于无法调和的悲剧性矛盾之中。艺术家的主观世界与丑陋的现实格格不入。客观现实是一座拥挤不堪的监狱,骑士密兰尼奋不顾身、竭尽全力冲出它的重围。如果说在鲁斯达维里的长诗中古典主义诗歌思维找到了自己的完美体现,那么巴拉塔什维里的抒情诗则是浪漫主义世界观的完美表达。

巴拉塔什维里是格鲁吉亚诗歌形式的真正革命者,他不仅彻底摆脱了传统诗学的束缚,而且善于创造和确立一种全新的、独具特色的完美形式。作为艺术家和思想家,巴拉塔什维里为整个十九世纪的格鲁吉亚文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不仅格鲁吉亚现实主义诗人的创作与他的诗歌遗产有密切联系,而且格鲁吉亚诗歌在以后的继续发展过程中也如此。

巴拉塔什维里的创作生涯虽然相对较短(1833—1845),但在这段时间里诗人却走完了艺术和思想发展的最重要里程。

诗歌《姆塔茨明德的黄昏》(1833—1836)应看作是巴拉塔什维里诗歌天才的最初鲜明表现。在《黄昏》中主要表现的是浪漫主义的崇高性,摆脱世俗的累赘,对世界永恒神秘力量的神往。尽管暗藏着不满,但这首诗的情绪却是平静的,充满着对没有实现的也无法实现的理想的忧愁之情。这里还没有他稍后的创作,其中包括《密兰尼》所具有的那种与命运抗争的主题。

《库尔河畔的沉思》(1837)是巴拉塔什维里第一首鲜明地表现出哲学特点的诗歌。诗人对人——“大地的儿子”(即公民)的看法,以及对公民的义务的看法都清晰地表达在诗的最后一节中:“但我们是作为大地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在大地上诚实劳作直到去世。/而那些只在大地记忆中的人是可悲的,/因为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形同走肉。”(鲍·帕斯捷尔纳克译)但这是《沉思》的最终结论。诗人认为,人的孜孜不倦的精神渴望,势不可挡的强烈激情,无穷无尽的美好愿望,是其各种活动、“劳动和操劳”的主要动因。

为新生活而觉醒的人们,其崇高志向与当时客观条件注定其与面对的那个现实状况势不两立,这就是诗人与现实发生冲突,对现实产生不满,以及构成巴拉塔什维里一系列诗歌作品(《神秘的感召》,1836年,《孤独的心灵》,1839年,等等)主旨的“无家可归”和“内心孤独”的病态感的根源。

爱情在诗人看来不单是转眼即逝的尘世快乐瞬间,而且是美好心灵的永久结合。巴拉塔什维里就像但丁在其《新生》中一样,永久地寻找着“失